

政治关联、制度环境与会计师事务所经营业绩

李江涛¹, 严文龙¹, 曾铁兵²

(1. 西南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 四川 成都 611130; 2.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北京 100039)

[摘要] 证券所与非证券所获取的政治关联通过信誉机制特别是制度信誉发挥作用, 这种作用的发挥还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实证分析表明, 政治关联能够对事务所经营业绩产生显著影响, 其中市县级政治关联的影响最为明显, 并且非证券所更容易受到政治关联的影响。此外, 在分别考虑制度环境中市场化水平、行政干预水平和法治化水平后发现: 不同的制度环境要素对事务所业绩的影响并不完全一致, 政治关联对事务所业绩的作用所产生的影响也有所区别。

[关键词] 信誉机制; 政治关联; 制度环境; 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质量; 审计费用

[中图分类号] F239.2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4833(2015)05-0032-12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20世纪中后期, 随着研究范围的不断拓展, 政治关联被纳入到了企业财务研究的视野。Krueger通过建立实证模型论证了良好的政治关联关系能给企业带来明显的经济利益^[1]。政治关联作为一个全世界普遍存在的现象, 在我国全面转型的国情中具有更加特殊的意义。在目前的制度环境与市场环境中, 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事务所)不仅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 还必须接受较一般企业更严格的政府监管, 因此拥有并合理利用必要的政治关联关系对其业务发展大有裨益。同时, 由于目前国内市场信誉机制尚不完善, 市场并不能高效识别纯粹的单位信誉和个人信誉^[2], 而制度信誉^①由于具有政府权力的强制性, 其公信力普遍更高, 发挥的作用也更稳定。所以, 我们将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 分析会计师事务所的政治关联度与经营业绩之间的不同关系, 为事务所在以后较高市场化水平下围绕着政治关联制度信誉建设展开相关研究提供有益的线索。

以往的学术研究中鲜有针对事务所业绩的研究, 这主要是由于受到我国早期法律法规对会计、注册会计师审计法律认知的影响。1993年通过的《会计法》修订案中提出“对严重违法损害国家和社会公众利益的收支, 会计机构、会计人员应当向主管单位或者财政、审计、税务机关报告”, 在会计监督中强调了会计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公权力监督的延伸。而1994年通过的《注册会计师法》通过设立较烦琐的审批制度强化事务所以及注册会计师“依法独立、公正执行业务”的角色。在不考虑效益的行政思维下, 事务所经营业绩问题虽然现实地制约着国内事务所的市场竞争, 却始终没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此外, 市场竞争的手段是市场认可的价格, 目的则是获取一定的经营业绩。我们往往从理论上假设审计价格的市场认可程度与事务所执业质量的正相关关系, 进而囿于事务所执业质量等市场

[收稿日期] 2015-01-1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5BGL052)

[作者简介] 李江涛(1976—), 男, 河南灵宝人, 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副教授,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后, 从事注册会计师审计、政府审计研究; 严文龙(1990—), 男, 四川达州人, 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硕士研究生, 从事注册会计师审计研究; 曾铁兵(1965—), 男, 北京人,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注册部主任, 从事审计理论研究。

^①制度信誉指基于对制度、政府的信赖而产生的信誉, 由于事务所行业内部制度规范具有一致性, 制度信誉更多的指向对政府或者政府行政行为的信赖而产生的信誉。

竞争的手段,忽略了统摄事务所审计质量与审计费用等具体竞争手段的事务所执业活动的真正目的——经营业绩。在未来的研究中只有跳出传统为了提高审计质量而讨论审计质量的无利可图的窘境,厘清事务所市场竞争目的与竞争手段的关系,认识到经营业绩对审计行为的统摄作用,才能促进事务所基于市场目的自主提高事务所执业质量,形成高质量高收益的良性循环。关注经营业绩才是从市场角度关注事务所行业的发展,这也顺应了《会计法》的修改趋势以及《注册会计师法》修订中简政放权的立法本意。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一)文献回顾

信誉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为“诚实守信的声誉或者信用与声誉”。张维迎将信誉表述为“为了获得交易的长远利益而自觉遵守合约的承诺”^[3]。1974年,Arrow就指出了信誉的重要性,认为信誉是社会经济系统赖以运行的主要“润滑剂”,信誉及类似的价值观都是商品,它们具有真正实际的经济价值^[4]。在Akerlof等人的现代经济理论中,信息不对称将阻碍买卖双方的市场交易,甚至使市场萎缩、消失^[5]。而在信息不对称的重复博弈市场交易中,信誉可以节约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增加交易发生的次数及成功的可能性,从而增加企业价值,成为解决市场失效的重要机制之一^[6]。Shapiro证明了当产品质量信息不能被市场识别时,信誉好的企业能够享受到价格溢价,并且这种溢价能促使企业在长期内维持信誉,而不是追求降低质量带来的短期收益^[7]。周黎安等使用易趣公司提供的网上拍卖交易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卖者的信誉评价不仅影响了物品拍卖成交的价格,还对拍卖成功的概率有着显著的正面影响^[8]。

政治关联的概念最早由Fisman在研究印尼企业与苏哈托家族的关系时提出。此后,Johnson和Mitton对这一概念进行了明晰,认为政治关联是指企业的高管或大股东与政府重要领导人员及家属存在的密切关系^[9]。基于资源依赖理论,在制度转型的国家,政府支配了大量的资源,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更容易获得相应的各种资源,进而提升经营业绩。Cull等的研究指出,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有政治关联往往被认为是企业具有良好发展前景和社会信誉的信号,更容易获得社会信赖^[10]。Francis等分析了1994—1999年中国股票市场的IPO过程,发现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在IPO时获得了明显的优惠,其报价更高,抑价更低等^[11]。制度环境是事务所经营发展的制度平台,与事务所经营业绩息息相关。新制度经济学中“制度”是指社会中的运行规则或人类设计的、正式的、规范人类交往的约束条件,制度在经济学上的核心属性是对企业有价值的经济服务的供给^[12]。制度基础论的观点认为社会经济层面的制度框架与企业行业及内在资源禀赋共同影响着企业的经营绩效^[13]。

Xin和Pearce以中国民营企业为样本,发现企业建立政治关联往往是为了弥补正式制度规范的保护缺乏,这种政治关联可被视为当前不完善的正式制度的替代机制^[14]。罗党论和唐清泉通过研究国内2002—2005年民营上市公司相关数据,也发现存在这种替代机制,且替代机制的实际效果因政治背景级别不同和制度环境的不同而不同^[15]。吴文锋等人对不同级别政府背景的公司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在考虑各地区的行政干预程度后,行政干预程度越高、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政治关联对公司价值的正向影响越明显;同时地方政府背景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比中央政府明显^[16],随着制度环境不断改善,政治关联程度对于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逐步减轻。

(二)理论分析

我们在分析政治关联之前有必要对其发挥作用的理论基础进行一个简单的分析。政治关联发挥作用主要是通过权力寻租-利益输送、信誉机制两个途径。权力寻租、利益输送的方式有很多,包括政府补贴、税收优惠、政策支持、行政推介等,并且在现实中也大量存在。然而这种方式由于存在违法诱因,在不断完善的法治社会建设中并不具有广泛的可持续性,并且可能使企业遭受法律风险。随着我国法治的逐步完善,真正长期持续的、合法的利益输送在竞争性行业中的应用范围很小。由于不存

在或者至少在程序上不存在违法诱因,信誉机制具有更广泛持续的适用性,并将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得更加广泛而重要。

信誉机制将是理解政治关联在不断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的关键(特别是在政治关联较为普遍的专业服务领域)。信誉具有获取困难而破坏却相当容易的特性,这使得事务所面临的信誉风险远大于短期收益,在市场中形成了以信誉资本为业务质量担保的趋势。就不同的信誉主体层次而言,信誉可以区分为个体信誉与单位信誉,并且两者相互影响^①。在事务所中,CPA 个人的信誉优势也可能转化为事务所的信用优势,个人的政治背景也会转换为事务所的政治优势。同时制度信誉往往更趋向于一次获得、长期有效,在制度环境越差的地方其功能的发挥更优于单位信誉和个人信誉。

一直以来,企业主要通过三种途径建立政治关联:一是企业机构通过特定途径参与政治而形成政治关联,国内集中表现为当选各级人大、政协委员及其他形式;二是企业招揽退休、辞职公职人员或者相关人员直接成立企业而形成政治关联,在八九十年代官员下海潮中这种现象比较突出,此外官员退休后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等,也是这种政治关联的表现形式;三是政府直接委任企业管理人员,这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一种途径,例如国资委掌控着央企的人事任免权,其派驻的管理层天然就带有一定的政治关联。我国事务所的发展经历了从挂靠行政单位到独立自主经营的过程。1998年前后,事务所逐步完成了与原挂靠单位的脱钩改制,取消了行政隶属关系,形成了独立的经营实体。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事务所的独立竞争市场主体地位不断增强,其政治关联的发展也转换到立足于事务所自身上来,进而形成了自主性的政治关联。政治关联俨然成了事务所自主获取市场资源的重要手段。事务所建立政治关联的方式主要表现为上文分析的第一、二种方式,然而由于事务所执业活动的专业性,一般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等辞退后很难进入相关领域,目前实务中事务所政治关联的建立方式更集中于注册会计师被选举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与行政机关不同,参政议政人员并没有直接的行政权力,其往往以自身的政治身份所赋予的政治信誉来提升事务所整体的制度信誉,进而为事务所带来经济利益,这是目前以及未来事务所政治关联发展及作用机制的趋势。

事务所是为企业服务的一种中介组织,其建立政治关联的目的是提升经营业绩,而影响业绩最根本的因素就是客户资源。事务所政治关联对事务所获取相关客户资源的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国内存在大量的国企和具有政治关联的私企,使得政治关联具有隐性的客户推介作用。根据《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的规定,我国的注册会计师不能进行广告宣传。但是作为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的注册会计师在参加人大、政协会议时,凭借其专业能力提出的提案,不仅展现注册会计师行业的专家形象,也为其所在的事务所进行了隐性的宣传。随着注册会计师信誉的提升,其所在事务所也会不断受益。第二,审计业务公平公正的属性使得具有政治关联的事务所更为公众认可。事务所接受审计业务实质上就是接受所有者的委托,向所有者负责。由于公司制的广泛存在,公司所有权的分散使得存在大量中小投资者,那么向所有者负责就具有一定的社会政治意义,特别是当审计客户为公众公司或者上市公司时,事务所在现有投资者、潜在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甚至社会公众中扮演公正审查的角色,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更重。在这样的背景下,具有政协委员、人大代表身份的注册会计师能够获得更高的社会认可度,其所在的事务所受到更多关注,事务所因此获得更多的鉴证与咨询服务业务,进而提高事务所绩效。

尽管事务所业务类型繁多,结合事务所业务范围、业务特点,我们仍可以按照交易发生的频率或者惯性将其分为经常性业务(年报审计业务、内审服务、代理记账以及依附于此类业务的咨询业务等)和非经常性业务(验资、重组清算、IPO 尽职调查等)。经常性业务是大多数事务所特别是非证券所的主要业务,由于业务定期发生,且更换事务所将面临较大的转换成本(如新的业务谈判成本以及

^①如史玉柱个人在巨人集团陷入困境后坚持还债,使得其后成立的公司享有一定的信誉优势。

业务熟悉成本)和商业风险,在实务中此类业务的交易惯性更强。在经常性业务中,事务所市场竞争的焦点在于交易的初次获得,在行政规范标准较为统一的环境下,政治关联对其影响则体现为初次交易时的制度信誉对信用的增强作用。同时,非经常性业务的客户由于具体业务目的不同,需应付的行政要求不同,更需要不断地获得制度信誉支撑,在实务中,客户更换事务所越频繁,政治关联对其影响也越频繁。由于非证券事务所发展规模较小,受相关行政法规限制,其业务范围更多的局限在经常性业务,而证券所则更活跃地参与非经常性业务,所以政治关联对证券所的影响往往更强。

此外,我国的行政级别分为国家级、省级、地市级和县级,注册会计师在担任不同行政级别的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时,这些不同的行政级别影响的地域范围不同、直接程度不同,进而对事务所本身绩效的影响也不同。一般而言,国家级、省级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其往往从宏观视角出发提出提案,并非仅仅使个别事务所收益。同时,高层级的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并不公开强调其所属事务所,其参与政治活动时的公共宣传效应也相对较弱。与之相反的是市县级的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他们在区域内提出议案时直接帮助本事务所的机会更大。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a:事务所通过政治关联获取竞争优势,提高经营业绩;

假设 1b:相对于非证券所,政治关联对证券所经营业绩的影响更强;

假设 1c:政治关联的层级越高,对事务所经营业绩的影响越小。

由于信誉机制作用的发挥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并且几乎所有的经济、政治活动都与其对应的制度环境密不可分,对政治关联的研究也必须考虑制度环境的影响。制度环境是生产交换与资源分配所依赖的基本的政治、社会和法律的规则集合,它构成了人类政治交易行为和经济交易行为的激励约束机制,不同的制度安排将导致不同的市场交易成本并通过影响企业的经济行为和市场反应来影响企业的经营业绩。制度环境本身是各方面制度体系的综合反映,必须予以细分才能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周建等所考察的制度环境主要包含地区政府支持市场化程度和经济法律环境水平^[17]。本文结合樊纲等人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相关指标,将制度环境区分为市场化水平、行政干预和法治水平^[18]。制度环境促进事务所经营业绩的根本手段是促进良性市场竞争,从执业范围、执业结构、执业水平等方面使市场中事务所经营业绩得到普遍提高。市场化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综合水平,也是完善和发挥制度环境,促进良性竞争平台作用的基础。在良好的市场经济中,首先企业享有充分的经营自由,企业完整的法人产权受到法律有效保护;其次,各个市场主体在政治上、法律上以及市场主体资格上是平等的;最后,市场准入的条件是一致的,而不存在对特定主体利益的“照顾”。良好的市场化水平使得自由市场的交易成本更低,随着国企改革不断推进,更多的自由市场主体将更加主动地参与到充分的市场竞争当中,以企业为代表的市场主体对审计、咨询等中介服务的需求更大、质量要求更高,这将进一步扩大、优化事务所的业务范围与业务结构,进而提高事务所的经营业绩,同时也有利于降低市场业绩对政治关联的路径依赖。行政干预是指政府以强制性权力干预市场活动,其可能破坏自由平等的市场竞争,虽然在特殊事件中也有一定积极意义,但长远看来并不利于市场经济的总体发展。法治水平是规范市场主体行为、促进有序竞争的重要保障。良好的法治水平能够有效地维护自由平等的市场竞争秩序,能够稳定地规范单位信誉的低交易成本和政治关联的高交易成本,是发挥制度环境平台作用的有效保障。总体而言,市场化从正面总体上促进良性市场竞争、扩大市场范围、优化业务结构,行政干预是对市场竞争外在的方向调节,法治则是为良性市场竞争提供法律保障,这三者从三个不同维度综合促进制度环境平台作用的发挥,降低 CPA 和事务所通过自由的竞争树立个人信誉、单位信誉的交易成本,有利于事务所自主地参与市场竞争,增强制度环境对事务所经营业绩的保障作用,减轻其在市场竞争中对政治关联所附带的制度信誉的依赖,最终有利于整个市场主体经营业绩的提升。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2a:制度环境越好,越有利于事务所经营业绩的提高;

假设 2b:制度环境越好,事务所经营业绩受到政治关联的影响越弱。

三、研究设计

(一) 样本数据

为验证上文所提出的假设,本文运用 STATA 12.0 软件,以中注协 2010—2012 年全国事务所的统计数据以及《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中相关制度环境数据为基础设计样本,以单个事务所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研究。我们在删除缺误样本的过程中充分考虑了实证分析的需要,进行了部分缺失数据的替代工作^①。

(二) 模型设定

为检验政治关联对事务所经营业绩的影响,我们利用已有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构造了以下七个模型:模型 I 利用政治关联存在变量对事务所业绩进行回归分析;模型 II 利用各级政治关联人数占比变量对事务所业绩进行回归分析;模型 III 利用各个市场化进程指标变量对事务所业绩进行回归分析;模型 IV 利用政治关联存在变量和各个市场化进程指标变量对事务所业绩进行回归分析;模型 V 利用各级政治关联人数占比变量和各个市场化进程指标变量对事务所业绩进行回归分析;模型 VI 利用政治关联存在变量、各个市场化进程指标变量及其交叉变量对事务所业绩进行回归分析;模型 VII 利用各级政治关联人数占比变量、各个市场化进程指标变量及其交叉变量对事务所业绩进行回归分析。同时,我们对每一类模型都按事务所是否具有证券审计资格细分为与之对应的两个回归方程以及总括的全样本回归^②。

$$\ln income = \alpha_0 + \alpha_1 ZZ + \alpha_2 Leainratio + \alpha_3 Numstuff + \alpha_4 Secfutqua + \alpha_5 Merge + \varepsilon 1 \quad \text{模型 I}$$

$$\ln income = \alpha_0 + \alpha_1 Natratio + \alpha_2 Proratio + \alpha_3 Citratio + \alpha_4 Leainratio + \alpha_5 Numstuff + \alpha_6 Secfutqua + \alpha_7 Merge + \varepsilon 2 \quad \text{模型 II}$$

$$\ln income = \alpha_0 + \alpha_1 MS + \alpha_2 GS + \alpha_3 LS + \alpha_4 Leainratio + \alpha_5 Numstuff + \alpha_6 Secfutqua + \alpha_7 Merge + \varepsilon 3 \quad \text{模型 III}$$

$$\ln income = \alpha_0 + \alpha_1 ZZ + \alpha_2 MS + \alpha_3 GS + \alpha_4 LS + \alpha_5 Leainratio + \alpha_6 Numstuff + \alpha_7 Secfutqua + \alpha_8 Merge + \varepsilon 4 \quad \text{模型 IV}$$

$$\ln income = \alpha_0 + \alpha_1 Natratio + \alpha_2 Proratio + \alpha_3 Citratio + \alpha_4 MS + \alpha_5 GS + \alpha_6 LS + \alpha_7 Leainratio + \alpha_8 Numstuff + \alpha_9 Secfutqua + \alpha_{10} Merge + \varepsilon 5 \quad \text{模型 V}$$

$$\ln income = \alpha_0 + \alpha_1 ZZ + \alpha_2 MS + \alpha_3 GS + \alpha_4 LS + \alpha_5 Leainratio + \alpha_6 Numstuff + \alpha_7 Secfutqua + \alpha_8 ZZ_MS + \alpha_9 ZZ_GS + \alpha_{10} ZZ_LS + \alpha_{11} Merge + \varepsilon 6 \quad \text{模型 VI}$$

$$\ln income = \alpha_0 + \alpha_1 Natratio + \alpha_2 Proratio + \alpha_3 Citratio + \alpha_4 MS + \alpha_5 GS + \alpha_6 LS + \alpha_7 Leainratio + \alpha_8 Numstuff + \alpha_9 Secfutqua + \alpha_{10} MS_score + \alpha_{11} GS_score + \alpha_{12} LS_score + \alpha_{13} Merge + \varepsilon 7 \quad \text{模型 VI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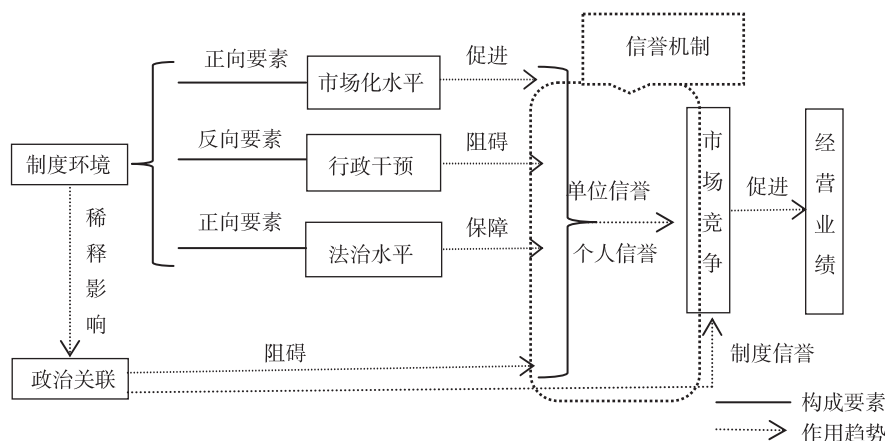


图1 制度背景与政治关联对经营业绩综合影响图

^①例如,只在大中所统计了证券期货资格,事实上小所也不可能拥有H股审计资格或者证券期货资格。为保证样本的数据完整性,对于这种能够明显识别区分的数据,我们在整理的时候将相关变量的缺失值直接改为0。

^②其中,模型I、模型II是政治关联模型,分析政治关联对事务所业绩的影响。模型III为制度环境模型,分析制度环境对事务所业绩的影响。模型IV、模型V为一次交叉模型,模型VI、模型VII为分项交叉模型,分析在一定制度环境影响下的政治关联对事务所业绩的影响。

(三) 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经营业绩的计量

目前主要采取两种方式定义经营业绩:一种是绝对值型,主要是指企业的业务收入;另一种是比率型,指企业的资产回报率或者净资产收益率。在分析过程中,还应当考虑业绩与绩效在概念上的区别。如果采用比率值计量经营业绩容易造成概念上的混淆,并且《辞海》中对业绩的解释为“完成的事业和成就”,并不是一个比率值的概念。同时本文主要是进行政治关联、制度环境与事务所经营业绩关系的分析,数值型的业务收入从业务流程上与两者关系更密切,更能够描述三者之间的关系,所以取事务所业务收入总数的对数即 $\ln(income)$ 。

2. 主要解释变量

本文主要解释变量的选择是依据已有的对政治关联和制度环境的理论实证研究中包含的各个要素来确定的。就政治关联而言,目前常见的解释变量有:是否具有政治关联、具有政治关联的人数、比例等等。而利用人数加权构造综合指数时,现有的权数确定方式中分级别取 1、2、3 等的权数设计未必合理,本文主要采用人数的方式,人数因素反映了事务所现有政治关联水平,同时我们对人数变量按行政级别分别予以描述。就制度环境而言,常见的解释变量主要是市场化进程指数、法律保护指数和行政干预指数。

(1) 政治关联解释变量

参政议政人员存在(ZZ)是指判断各个事务所是否存在各级参政议政人员,如果存在则 ZZ 取 1,否则取 0。参政议政人数占比即各级参政议政人数占比,包括以下三个指标:全国人大、政协人数占总人数比例($Natratio$);省人大、政协人数占总人数比例($Proratio$) 市县级人大、政协占总人数比例($Citratio$)。

(2) 制度环境解释变量

由于《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的数据截止于 2009 年,而事务所的相关数据则包括 2010—2012 年,两种数据并不匹配,需要为 2010—2012 年的市场化数据寻找一种替代数据。已有的研究中,唐国平等用 2007—2009 年的市场化数据平滑预测了 2010 年、2011 年各省的市场化数据^[19]。由此可见,利用某种方式寻找替代的市场化数据是可接受的。此外,市场化报告中的数据并不是绝对数而是相对得分排序,由于 2008—2009 年各地区市场化排序相对稳定,我们用 2007—2009 年的市场化数据替代 2010—2012 年的市场化数据,不仅保持了各地区序列的相对稳定性,而且还避免了线性预测所计算出的数据对样本可靠性的破坏和其他相关信息的丢失。同时在考虑政治关联与相关指数的交叉影响时,我们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政治关联各解释变量进行综合计算,得出一个综合得分($score$)作为政治关联的综合影响因子。由于本文并不试图借用一个或者特征值大于 1 的多个主成分替代原始数据进行分析,而是利用所有主成分变量构成原始变量的综合得分,所以不必要考虑其 KMO 检验。

市场化水平包括市场化进程指数(MS)和市场化进程与政治关联的交叉影响,对应于参政议政人员存在的 ZZ_MS 和对应于分级别政治人数占比的 MS_score 。

行政干预水平包括行政干预指数(GS)和行政干预指数与政治关联的交叉影响,对应于参政议政人员存在的 ZZ_GS 和对应于分级别政治人数占比的 GS_score 。

法治化水平包括法治化进程指数(LS)和法治化进程与政治关联的交叉影响,对应于参政议政人员存在的 ZZ_LS 和对应于分级别政治人数占比的 LS_score 。

3. 主要控制变量

(1) 证券资格($Secfutqua$)

证券资格变量是证券期货资格变量的简称,是 0/1 变量,反映事务所是否取得证券期货审计资格。如果取得,则从制度上表明事务所具备审计证券期货相关业务的能力,相较于其他尚无相关资格

的事务所,其业务能力往往更强。该变量是为了对制度信誉进行控制分析。由于制度信誉是根据对制度或者政府的信任而产生的信誉。证券资格变量表示在事务所行业中基于对制度的信任而产生信誉的那一部分,这样就能更好地分析政治关联所附带的基于对政府、政府行政行为的信任而产生的信誉对事务所业绩的影响。

(2) 主任会计师持股比例 (*Leainvratio*)

主任会计师持股比例即事务所主任会计师持股份额占事务所股份总额的比例。由于与制度环境相关的解释变量均为外部影响变量,而与政治关联相关的解释变量虽然反映了事务所内部特定人员情况,但分析的依然是政治关联从外部对事务所的影响。主任会计师持股比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事务所内部的股权结构和治理状况,能够部分地描述事务所内部治理对事务所业绩的影响。由于事务所经营业绩一定是事务所内外部因素的合力,将主任会计师持股比例作为控制变量有利于控制事务所内部治理对分析结果的干扰。

(3) 事务所合并变量 (*Merge*)

事务所合并事项对事务所经营业绩的影响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规模扩张的影响,这一部分我们已经通过全体员工人数来进行控制;另一个是协同效应,是由于协调原有资源配置而优化资源结构,进而产生的合并溢价影响,这一点往往发生在合并后的近几年内。我们的数据包含了 2010—2012 年,并且我们站在合并后壮大的事务所角度将合并事件发生当年及后一年标注为 1,其余为 0。同时,本文对于被合并方发生部分剥离业务、人员的被合并事项后仍然部分存续的事务所并不标示为合并。我们先通过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公布的年度审计快报收集整理得到发生审计机构变更的上市公司,然后通过查询上述上市公司的年报,进一步判断审计师变更是否由于事务所合并而导致,进而确定事务所是否发生合并。我们并没有选择 GDP 相关指标作为控制变量,是因为一方面许多事务所执业活动往往是跨区域的,是涉及多个省市的活动;另一方面,很少有事务所的业务范围覆盖全国所有省市。那么无论我们选择事务所注册地所在省的 GDP 增长率或者是 GDP 存量还是选择全国的 GDP 增长率或者 GDP 存量,从执业活动上讲都与事务所经营业绩关系不大。此外,目前我国大型的事务所多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少数重点城市,其中一些作为直辖市的城市往往单独核算其 GDP,无论 GDP 存量还是增速与全国其他省份并不具有可比性,所以 GDP 相关指标内部结构并不合理。然而从谨慎性考虑,我们将相关指标放到了稳健性回归里面。

表 1 变量定义说明

变量名称	符号	变量解释
业务收入	<i>Lincome</i>	业务收入
参政议政人员存在	<i>ZZ</i>	<i>ZZ</i> = 1 表示事务所存在参政议政人员,否则 0
国家参政议政人员占比	<i>Natratio</i>	(全国人大代表 + 全国政协委员)/员工总数
省级参政议政人员占比	<i>Proration</i>	(省级人大代表 + 省级政协委员)/员工总数
市县参政议政人员占比	<i>Citratio</i>	(市县人大代表 + 市县政协委员)/员工总数
市场化进程指数	<i>MS</i>	来自《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
市场化交叉影响 1	<i>MS_score</i>	<i>MS</i> × <i>score</i>
市场化交叉影响 2	<i>ZZ_MS</i>	<i>ZZ</i> × <i>MS</i>
行政干预指数	<i>GS</i>	来自《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
行政干预交叉影响 1	<i>GS_score</i>	<i>GS</i> × <i>score</i>
行政干预交叉影响 2	<i>ZZ_GS</i>	<i>ZZ</i> × <i>GS</i>
法治化指数	<i>LS</i>	来自《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
法治化交叉影响 1	<i>LS_score</i>	<i>LS</i> × <i>score</i>
法治化交叉影响 2	<i>ZZ_LS</i>	<i>ZZ</i> × <i>LS</i>
证券期货审计资格	<i>Secfutqua</i>	<i>Secfutqua</i> = 1 表示具有资格,否则为 0
主任会计师持股比例	<i>Leainvratio</i>	
全体员工人数	<i>Numstuff</i>	
事务所合并事项	<i>Merge</i>	<i>Merge</i> = 1 表示当年或本数据 3 年内前期发生过合并,否则 <i>Merge</i> = 0

四、实证分析结果

(一)描述性分析

表2 回归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全样本			证券所			非证券所			分样本差异比较	
	Mean	p50	Sd	Mean	p50	sd	Mean	p50	sd	t 值	p 值
<i>Lnincome</i>	4.93	4.88	1.44	8.48	8.02	1.36	4.84	4.85	1.33	-60.80	0.00
<i>ZZ</i>	0.05	0.00	0.23	0.33	0.00	0.47	0.05	0.00	0.21	-28.00	0.00
<i>Natratio</i>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0.98	0.00
<i>Proration</i>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5.25	0.00
<i>Citratio</i>	0.00	0.00	0.01	0.00	0.00	0.01	0.00	0.00	0.01	0.86	0.39
<i>MS</i>	8.36	7.88	1.84	8.88	9.02	1.75	8.35	7.88	1.84	-6.43	0.00
<i>GS</i>	8.80	8.95	1.13	8.94	9.14	1.02	8.79	8.95	1.13	-2.81	0.00
<i>LS</i>	8.73	7.15	4.38	10.45	8.41	4.79	8.69	7.15	4.36	-8.93	0.00
<i>Leainvratio</i>	50.63	50.00	25.06	20.90	16.86	19.81	50.84	50.00	24.97	14.16	0.00
<i>Numstuff</i>	33.69	17.00	156.70	455.60	112.00	902.00	23.89	17.00	45.07	-67.04	0.00
<i>Merge</i>	0.01	0	0.11	0.18	0	0.39	0.01	0	0.09	-31.87	0.00

从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就政治关联因素而言,第一,整体上拥有参政议政人员的事务所比较少,其中位数仅为0.00,然而参政议政人员的分布表现出较强的集中性,全样本和分样本的数据均值均大于中位数值,主要分布在证券所与非证券所的个别样本当中。第二,证券所的全国和省级参政议政人员占比显著高于非证券所占比,这也反映了两所所涉及的政治关联在政治级别上的不同。而在市县级参政议政人员占比上,两者之间并没有明显差别,这可能反映市县级参政议政人员对事务所都具有普遍的重要性。就制度环境而言,证券所与非证券所在三个制度环境变量之间都具有明显的差异,这说明目前的事务所分布地域特点明显,证券所多集中在市场化水平较高、制度规范良好以及政府行政干预较少的地方,而非证券所则更多地分布在其他地方。就控制变量而言,证券所的主任会计师持股比例明显高于非证券所,证券所的人数规模明显大于非证券所,此外事务所合并事项主要发生在证券所之间。

(二)政治关联模型

表3 政治关联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I			模型 II		
	证券所	非证券所	全样本	证券所	非证券所	全样本
<i>Natratio</i>				-355.60*** (-3.58)		-2,773.08 (-0.62)
<i>Proratio</i>				-116.72** (-2.48)	3.96	5.52* (1.85)
<i>Citratio</i>				97.58*** (3.06)	1.41** (2.00)	1.94*** (3.52)
<i>Leainvratio</i>	-0.02*** (-2.97)	0.00** (2.00)	0.00** (2.12)	-0.02*** (-3.94)	0.00** (1.99)	-0.00*** (-3.40)
<i>Numstuff</i>	0.00*** (5.05)	0.02*** (9.21)	0.00*** (2.97)	0.00*** (4.54)	0.02*** (9.28)	0.00*** (7.71)
<i>Merge</i>	-0.05 (-0.68)	0.11** (2.43)	-0.01 (-0.28)	-0.03 (-0.31)	0.10** (2.38)	0.03 (0.43)
<i>ZZ</i>	0.27*** (5.25)	0.07** (2.02)	0.14*** (4.16)			
<i>Secfutqua</i>			0.76** (2.06)			2.36*** (7.05)
<i>Constant</i>	9.73*** (50.92)	4.24*** (71.40)	4.72*** (154.33)	9.85*** (49.99)	4.23*** (71.07)	4.77*** (186.24)
<i>Obs</i>	140	19,527	19,667	140	19,525	19,665
<i>R-squared</i>	0.53	0.07	0.01	0.53	0.07	0.02

注:非证券所没有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模型II中全样本为随机效应回归,对应的F值为Wald值。其他采用固定效应回归。在stata回归命令option段采用robust控制异方差。*** p<0.01,** p<0.05,* p<0.1,下同。

通过表3可以看出:(1)从参政议政人员存在变量来看,参政议政人员与事务所业绩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同时参政议政人员与证券所业绩的相关性更显著。(2)从分级别人员结构比例来看,仅市县级参政议政人员占比与两类事务所业绩均显著正相关。各事务所注册地址都在城市,市县级政治关联与事务所联系最为密切,市县级参政议政人员对事务所业绩的影响更普遍。在证券所中,国家及省级参政议政人员与事务所业绩显著负相关。这可能是由于这些人员在参与国家与省的管理事务中,更多从政治的高度为社会发展建言献策,并未过多考虑本事务所的发展。(3)控制变量与经营业绩基本都显著相关,其中证券所的主任会计师持股比例与其业绩显著负相关,而非证券所则显著正相关,从股权分散所具有的治理作用可以看出,证券所的股权治理机制更完善,而非证券所主任会计师集中持股的趋势更明显。员工总人数与事务所业绩显著正相关,而证券期货审计资格与经营业绩显著正相关。然而,事务所合并变量的系数基本不显著为负,这可能是由于数据截至2012年,发生在同年的合并事项对合并后事务所可能的协同效应并没有表现出来,而合并当期的内部组织调整磨合影响了合并后组织整体业绩的提升。这些都与经验和预期结果基本一致。

(三)制度环境模型

从表4的结果可以看出:(1)总体而言,市场化进程和法治水平与事务所业绩显著正相关,但非证券所受制度环境影响更强。联系描述性统计的结果可以发现,证券所的分布多集中在制度环境较好的省份,其所处的制度环境差异性较小。而非证券所分布更广泛,制度环境的差异性更明显,其对事务所业绩的影响更显著。(2)行政干预与事务所业绩普遍显著负相关,比市场化进程和法治水平影响更加广泛。我国目前正处在制度转型时期,行政干预的手段多样且涉及面广,同时又与经济发展和市场化进程背道而驰,其对事务所业绩的负向影响也更广泛和深刻。(3)控制变量对事务所业绩的影响与政治关联模型的结果较为一致,人员数量和证券期货资格与经营业绩显著正相关,主任会计师持股比例在证券所中负相关,在非证券所中正相关。

(四)制度环境下的政治关联模型

对比分析交叉变量前后的结果,我们可以发现以下现象。在考虑交叉变量以前:(1)模型IV中各个解释变量回归系数的正负性和显著性与模型I、模型III单独的回归分析结果基本一致,制度环境中市场化进程和法治水平与事务所业绩保持正相关,而行政干预则与之负相关。政治关联与事务所业绩显著正相关,但是显著性程度有所降低。可以看出整体上制度环境对政治关联能否发挥作用的影响有限。(2)模型V中,政治关联各级变量的系数变化较大,而制度环境各变量系数与模型II、模型III的相关系数在方向和显著性上比较一致。可以看出制度环境对事务所业绩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而政治关联对事务所业绩的影响在方向和程度上明显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市县级政治人数占比变量与事务所业绩虽然正相关,但显著性有所下降,其对证券所的影响受到制度环境明显稀释。省级及国家级政治人数占比对经营业绩的影响由负向变为正向,其中国家级政治人数占比与经营业绩显著正相关。可以看出,在考虑制度环境后,政治关联对事务所业绩的影响均为正向,且非证券所明显受到市县级政治关联的影响,证券所还显著受

表4 模型III制度环境回归结果

变量	证券所	非证券所	全样本
<i>MS</i>	0.07 (1.03)	0.19*** (9.28)	0.18*** (8.83)
<i>GS</i>	-0.40** (-2.64)	-0.54*** (-26.60)	-0.55*** (-26.68)
<i>LS</i>	0.02 (1.43)	0.02*** (5.14)	0.03*** (6.73)
<i>Leainvrat</i>	-0.01** (-2.41)	0.00** (2.03)	0.00** (2.14)
<i>Numstuff</i>	0.00*** (4.82)	0.02*** (9.00)	0.00*** (2.95)
<i>Merge</i>	0.02 (0.20)	0.07 (1.54)	-0.03 (-0.57)
<i>Secfutqua</i>			0.75*** (2.75)
<i>Constant</i>	12.87***	7.32*** (42.27)	7.84*** (46.48)
<i>Obs</i>	140	19,527	19,667
<i>R-squared</i>	0.63	0.19	0.14

注:对所有回归采用固定效应回归。

到国家级政治关联的影响。证券所与非证券所竞争的政治关联资源可能对象不同,但基层的政治关联相关人员都是它们必须争取的对象。在考虑交叉变量的模型VI与模型VII中:(1)政治关联对事务所经营业绩的影响受到明显的稀释,其中ZZ的系数显著性普遍降低,非证券所与全样本回归的ZZ系数均不显著;而各级政治人数占比的结果在正负方向上与模型II较为一致,显著性明显下降,仅仅只有证券所中市县级政治关联因素保持显著。(2)制度环境对事务所业绩的影响比政治关联更具有稳定性。(3)交叉变量的影响普遍不显著。模型VI中,证券所交叉变量中仅仅行政干预与法治水平相关因素对事务所业绩具有显著影响。模型VII中法治水平的相关交叉变量与事务所业绩的关系表现为在证券所中显著为负,非证券所中不显著为正。可以看出,就证券所而言,法治水平相关交叉变量的系数较为一致,其本身与事务所经营业绩正相关,而交叉项则为负相关。法治比市场化更具有广泛有效的强制性,在一个法治水平更高的地区建立政治关联,不仅成本更高,而且容易使事务所自身发展受到参政议政人员法律监管等方面的困扰。联系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证券所所处地区法治水平更高,内部差异较小,而非证券所次之,所以交叉项对证券所的影响比非证券所消极。在所有制度环境要素中法治水平是最稳定也是最难以被政治关联规避的因素。这也为我们在制度转型中寻找克服政治关联对事务所经营业绩的非正常影响、建立和维护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提供了思路。

表5 制度环境下的政治关联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IV			模型V		
	证券所	非证券所	全样本	证券所	非证券所	全样本
<i>Natratio</i>				1,284.91*		-2,514.56
				(1.86)		(-0.59)
<i>Proratio</i>				2.77	3.74	6.28**
				(0.06)	(1.19)	(2.17)
<i>Citratio</i>				42.92*	1.60***	2.31***
				(1.70)	(2.66)	(4.31)
<i>MS</i>	0.06	0.19***	0.18***	0.13	0.19***	0.23***
	(0.93)	(9.30)	(8.89)	(1.52)	(9.31)	(14.50)
<i>GS</i>	-0.37**	-0.54***	-0.55***	-0.31***	-0.54***	-0.33***
	(-2.44)	(-26.62)	(-26.71)	(-3.23)	(-26.62)	(-20.25)
<i>LS</i>	0.01	0.02***	0.03***	0.01	0.02***	0.05***
	(1.08)	(5.13)	(6.67)	(1.05)	(5.14)	(13.47)
<i>Leainvrat</i>	-0.02**	0.00**	0.00**	-0.01*	0.00**	-0.00***
	(-2.44)	(2.03)	(2.14)	(-1.85)	(2.02)	(-3.70)
<i>Numstuff</i>	0.00***	0.02***	0.00***	0.00***	0.02***	0.00***
	(5.02)	(8.97)	(2.95)	(12.72)	(9.04)	(7.38)
<i>Merge</i>	0.01	0.07	-0.03	-0.11	0.06	0.04
	(0.17)	(1.52)	(-0.59)	(-1.01)	(1.46)	(0.70)
<i>ZZ</i>	0.16**	0.08**	0.13***			
	(2.31)	(2.24)	(3.97)			
<i>Secfutqua</i>			0.71**			2.30***
			(2.37)			(6.88)
<i>Constant</i>	12.65***	7.32***	7.83***	11.04***	7.31***	5.35***
	(10.60)	(42.29)	(46.45)	(14.22)	(42.21)	(59.78)
<i>Obs</i>	140	19,527	19,667	140	19,525	19,665
<i>R-squared</i>	0.66	0.19	0.15		0.19	

注:模型V与模型VII中证券所回归采用随机效应,其对应的两个F值为Wald值。其他均采用固定效应。

五、稳健性检验

本文还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测试。重新构造政治关联模型即模型I,构造新解释变量:是否存在国家级参政议政人员(*nat*),如果存在则 $nat = 1$, 否则为0;同理,用 *pro* 表示是否存在省级参政议政人

员,用 *cit* 表示市县级参政议政人员。重新构造制度环境模型即模型 II,构造新解释变量:首先对 2007—2010 年各省份市场化指数按年度从小到大排序,生成序数指标(*wms*)。同理,生成行政干预序数指标(*wgs*)和法治水平序数指标(*wls*)。重新构造制度环境下的政治关联模型即模型 III,将新生成的政治关联解释变量和制度环境解释变量结合。此外,由于 GDP 相关指标是一个普遍考虑的指标,我们将各省的 GDP 增长率(*Gdpr*)作为控制变量添加到每个模型当中。

对比稳健性回归结果与上文结果,我们发现:(1)结果与上文大体一致,市县级参政议政人员对事务所业绩影响最强;行政干预与事务所业绩普遍显著负相关;法治水平对事务所业绩的影响具有较强的稳定性。(2)不一致的部分主要是市场化水平与事务所业绩相关性为负,这主要是采用序数变量后造成方差扩大,波动与原始数据不一致等因素引起。(3)总体来说,上文分析结果具有一定稳健性。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由于不同事务所所处业务环境、地域制度环境发展程度不同,政治关联对事务所业绩的影响也各不相同。但是总体看来,政治关联对证券所的影响更强;不同级别政治关联对事务所业绩影响不同,制度环境对事务所业绩的影响更稳定。在政治关联的影响中,市县级政治关联对事务所的影响较为突出,但是随着制度环境的改善,较高级别的政治关联对事务所业绩的影响开始变得显著,此外政治关联对证券所和非证券影响并不一致;在制度环境分析中,市场化和法治水平本身与经营业绩正相关,其交叉项与经营业绩负相关,行政干预与经营业绩负相关,其交叉项影响并不一致。制度环境除了其本身和交叉影响外,还通过稀释和增强政治关联对事务所经营业绩产生影响。从本文对事务所的研究可以看出,要实现会计师事务所做大做强目标,在政策层面重要的就是提供更高的法治水平和减少行政干预;在事务所层面,要有利于事务所自身的业绩发展就不得不综合利用制度环境与政治关联的相关因素,首先争取打破执业限制,取得证券期货等资格,拓展更高层次的执业范围,其次要选择高市场化水平、法治水平,低行政干预的城市执业;再次要充分注重基层政治关联人员对业绩的影响;最后还应当充分注意到事务所内部股权结构的合理安排以达到更好的治理作用。

既然政治关联无疑将在一定程度上长期影响事务所经营活动,那么在从形式上总结了政治关联、制度背景等因素对事务所经营业绩的影响后,我们有必要从实质上总结政治关联作用机制转变后,事务所现有政治关联如何适应未来法治社会的发展,进而为事务所的发展提供长效动力、避免违法政治关联操作风险的干扰。第一,随着法治建设的不断完善,权力寻租、利益输送等获益方式必然不可持续,而信誉机制将更加长久稳定地影响事务所的市场经营活动。第二,市场化水平的提高使得信誉机制在事务所市场竞争中作用更强,也不可避免地对事务所信誉建设(包含个人信誉、单位信誉和制度信誉)提出了更高要求。那么,围绕着信誉建设的政治关联的合理利用对事务所提升市场竞争力大有裨益。然而单独强调事务所内部信誉建设而不改变事务所交易市场环境则其作用必然有限。结合当前市场化转型的时代潮流,会计师事务所行业的整体信誉建设从内部上讲应当逐步地从制度信誉过渡到更多地依赖单位信誉和个人信誉上来,从外部环境上讲应当转换目前基于熟人交易的信誉产生机制,将事务所、客户一一对应的业务关系转变成公开平台的整体市场竞争关系。提高审计服务的市场可见性与公开性,从而转变当前的多次熟人交易模式,增加中小事务所的市场参与机会,让市场竞争更广泛地促进行业发展。同时,由于本文尚未考虑研究样本自选择问题、在政治关联解释变量的设置时是否加入中注协理事相关人员,以及协会相关人员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涉及人员重复的处理等相关问题,必然导致相关研究结论的局限性,同时政治关联与事务所经营业绩在国内还缺乏足够的研究,相关理论分析尚待进一步拓展。

参考文献:

- [1] Krueger A O.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nt - seeking society[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4,64(3) : 291 - 303.
- [2] 程承坪. 信誉的生成机理及对我国加强信誉建设的启示[J]. 社会科学辑刊,2003(4) :62 - 67.
- [3] 张维迎,柯荣住. 信任及其解释:来自中国的跨省调查分析[J]. 经济研究,2002(10) :59 - 70.
- [4] Arrow K J. The limits of organization[M]. New York:w. w. Norton,1974.
- [5] Akerlof G. 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0,84(3) : 488 - 500.
- [6] Klein. Reputation[M].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7.
- [7] Shapiro C, Premiums for high quality products as returns to reputations[J].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98(4) :659 - 680.
- [8] 周黎安,张维迎,顾全林,等. 信誉的价值:以网上拍卖交易为例[J]. 经济研究,2006(12) :81 - 91.
- [9] Johnson S, Mitton T. Cronyism and capital controls: evidence from Malaysia[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3,67(2) :351 - 382.
- [10] Cull R, Xu Lixin, Colin. Institutions, ownership and finance: the determinants of profit reinvestment among chinese firms[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4,77(1) : 117 - 146.
- [11] Francis B B, Hasan X S.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the process of going public: evidence from China[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2009,28(4) :696 - 719.
- [12] North D. Institutions[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1, 5(1) : 97 - 112.
- [13] Peng M W.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strategic choices[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3, 28(2) : 275 - 296.
- [14] Xin K R, Pearce J L. Guanxi: connections as substitute for normal institutional support[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6,39(5) :1641 - 1658.
- [15] 罗党伦,唐清泉. 中国民营上市公司制度环境与绩效问题研究[J]. 经济研究,2009(2) :106 - 118.
- [16] 吴文锋,吴冲锋,刘晓薇. 中国民营上市公司高管的政府背景与公司价值[J]. 经济研究,2008(7) :130 - 140.
- [17] 周建,方刚,刘小元. 制度环境、公司治理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研究[J]. 南开管理评论,2009(5) :18 - 27.
- [18] 樊纲,王小鲁,朱恒鹏. 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
- [19] 唐国平,李龙会,吴德军. 环境管制、行业属性与企业环保投资[J]. 会计研究,2013(6) :83 - 89.

[责任编辑:刘 茜]

Political Association,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the Accounting Firm Operating Performance

LI Jiangtao¹, YAN Wenlong¹, ZENG Tiebing²

(1. School of Accounting,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1130, China;

2. Chinese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Beijing 100039, China)

Abstract: The political connection of the accounting firms that whether have the qualification of securities and futures or have not plays a vital role through the credit mechanism, especially institutional credit and the role is also affected by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The empirical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political connection can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firms' performance especially the rank of political association belonging to city or county and the firms having no the qualification of securities and futures are more susceptible to the influence of political connection. Moreover, by considering the factors of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such as market level, administrative intervention level and legal level of system environment, we found that different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factors' impact on firm performance is not exactly the same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role played by political connection in firms' performance is also not consistent.

Key Words: reputation mechanism; political connection;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ccounting firms; audit quality; audit fees